

毛文體與個人敘述

——評劉再復《現代文學諸子論》

● 沈衛威



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隊伍是政治一意識形態的一支力量，類似文學禁軍。劉再復雖在皇家統領過禁軍，但他是一位保持着童心本色的值得敬重的學者，沒有被「黑染缸」污染。

劉再復：《現代文學諸子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一 詩人之文與學者之詩

劉再復的學術著作，總是不自覺地留下一些沉重的道德說教和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面對太多的意識形態的干預、人性的醜惡和「黑染缸」文化的強大污染力，他的道德勇氣既顯得難能可貴，又顯得蒼

白無力。這不是劉再復的錯，而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悲。劉再復就像魯迅筆下的「過客」，從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走向世界，背負感時憂國的沉重。讀他的文章，筆者感受到他是那麼的痛苦、焦慮、孤獨和悲愴。儘管他十分欣賞、認同高行健所說的「寫作可以逃逸到最深的感受中」^①，但他的激情和童心，他「逃逸」的「感受」，讓筆者感受到的是他摯愛的魯迅的《野草》心境。

劉再復是筆者讀研究生時號稱隊伍三千人的「禁軍教頭」。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隊伍是政治一意識形態的一支力量，類似文學禁軍。劉再復雖在皇家統領過禁軍，但他是一位保持着童心本色的值得敬重的學者，沒有被「黑染缸」污染。劉再復從中國現代小說的政治式寫作和廣義革命文學的理性批判，到對1949年以後詩文中「新台閣體」和丁玲、周立波小說的革命暴力敘事的批評，進而提出「告別革命」和「放逐諸神」；由對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學中謳歌文學和挽歌文學兩大現象的反思，他進入了能夠「直面自身和直面信念」的理性的自由境界^②。

劉再復是最早發現高行健作品的文學價值並一直關注他的學人，

和馬悅然 (N.G.D. Malmqvist) 是高行健的中外知音。劉再復有《論高行健狀態》等專著，他是「到處逢人說項斯」。《現代文學諸子論》(引用只註頁碼) 中收錄有《論高行健狀態》之後寫的四篇關於高行健的文章，頗見功力，也頗具獨識。從劉劍梅的〈引論〉中得知，高行健把諾貝爾文學獎獎章的副章贈送給了劉再復，並伴有一幅「得一知己足矣」的字墨之禮(頁ix)。劉再復在隨後的文章中坦言他從高行健的各種文本和直接的交流中感受到共悟共鳴的大快樂^③。

劉再復認同高行健對禪宗的體悟：活生生的佛就在自己的心中。「自由不在身外而在身內，一切都取決於自己的心靈狀態」。高行健追求並得到了「大自在和大自由」(頁68)。針對高行健的創作，劉再復提出了「文學狀態」、「內心煉獄」、「內在主體際性」、「普世性寫作」、「黑色鬧劇」等多個關鍵詞。他認為「文學狀態是一種非功利，非功名的狀態；是一種從政治權力和市場權力逃離出來的高度自由的表達狀態；也是一種在生命深處保持本真本然的人性狀態」(頁71-72)。因此，劉再復認為高行健是「一個最具有文學狀態和最具有徹底的文學立場的中國作家」(頁71)。他還用這樣一段話揭示高行健的世界觀和創作觀：

確定「自救」先於救世，並確認自救最重要的是從自我的牢籠中與自我的地獄中「逃亡」出來，又確認這種救贖方式是作家贏得精神自由的最切實的途徑，這是高行健最基本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也是他的創作觀。(頁109)

作為戲劇家的高行健，在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所歸結的「人與上帝」、「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四種現代戲劇傳統之外，又創造了「自我與自我」(「真我與假我」) 的第五種主題關係，並形象地將其展示為「自我乃是自我的地獄」。這是對薩特 (Jean-Paul Sartre) 「他人是自我的地獄」的更高一個存在層面的發展(頁103)，同時也是得自禪宗的啟示。

在具有自由和革命狂熱傳統的法國，高行健給「革命狂」的藝術家開出的藥方，就是「回到脆弱的個人」(頁120)。他認為「藝術家其實同常人一樣脆弱，承擔不了拯救人類的偉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頁121)。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思想。同時說人脆弱，是他們相對於大自然和社會大潮流，如同蘆葦。會思想的人就像風中的蘆葦，最需要的恰恰是靈魂的自救和自審。因此，劉再復說：「高行健在中國禪宗文化支持下的『自救』意識與『自救』文字，給人類精神文化提供了別一境界，也給靈魂對話創造了一種新的形式。」(頁131)

前引高行健的「自救」之說，實際上胡適早在1918年所寫的〈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已提出了「救出自己」的主張，並強調「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胡適說^④：

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份子。……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

胡適1930年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裏發出更強烈的聲音^⑤：

在具有自由和革命狂熱傳統的法國，高行健給「革命狂」的藝術家開出的藥方，就是「回到脆弱的個人」。說人脆弱，是他們相對於大自然和社會大潮流，如同蘆葦。

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這就是胡適思想的力量，並在高行健這裏得到回應。

二 兩代人的文體記憶

筆者是1962年初出生的人，那是一個真正的飢餓的歲月。筆者的「童子功」不是子曰詩云，讀的是毛澤東的書，說的是毛澤東的話。上中小學時，一到寫作文的時候，老是耳邊響起毛澤東的教導。讀劉再復的文章，只要讀到其宏觀論述或高度概括的段落，就「耳邊響起毛澤東的教導」。仔細一看，原來劉再復寫作時也是如此。那種特殊年代的特殊影響所留給劉再復的寫作印迹，即便是去國十多年仍無法擺脫。這是筆者的父輩和這一代人的「文體記憶」，誰都無法擺脫。劉再復文章如今仍有「毛體」的絕對文風——主要是文辭上的，而非內容，不知劉再復自己是否能感覺得到。毛的影響無處不在，就像你在中國必須使用人民幣一樣，大頭像伴隨你的日常生活。

毛澤東是新文化運動養育的，在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宣傳部代部長，在沒有秘書寫文章之前就練就了一手好的白話文。他的文章大氣

磅礴，善於用排句，有話語的絕對霸氣。連胡適也認為他的弟子門生和旁聽生中，毛澤東的詩雖有用錯韻腳，但白話文寫得最好。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對魯迅作出了最高的評價^⑥：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看一下劉再復寫於2003年9月的〈巴金的意義〉，其中引述他1986年在「新時期文學十年」大型學術會議上的主題發言中對巴金的評價：

可以說，他晚年創作的這些現代散文，是五四以來繼魯迅的雜文之後我國最傑出的現代散文，是我國現代散文史出現的又一座高峰。這些散文是時代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在十年浩劫中的眼淚所凝聚的晶品，是中國知識份子付出巨大代價而獲得的文化報償。在巴金的散文中，有一顆從煉獄中升華了的最清醒、最純潔、最美麗的靈魂。（頁48）

活脫脫的一個「毛體」。他用毛澤東評價魯迅的文體方式來評價巴金。毛澤東連用六個「是」，五個「最」；劉再復連用五個「是」，四個「最」。因為巴金的地位不可以比魯迅高。而且，兩個人都將魯迅、巴

劉再復文章如今仍有「毛體」的絕對文風——主要是文辭上的，而非內容，不知劉再復自己是否能感覺得到。毛的影響無處不在，就像你在中國必須使用人民幣一樣。

金的名字與「中華民族」緊緊地聯在一起。

毛澤東於1938年10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⑦：

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劉再復在1998年化用以上的話來評價通俗文學作家金庸：

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頁134）

毛澤東用「教條主義」，劉再復用「意識形態教條」；毛澤東用「洋八股」，劉再復用「歐化」；毛澤東用「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劉再復用「中國風格和氣派」。這是甚麼時候？是1998年。

當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劉再復用當年周揚評價趙樹理的說話方式來評價高行健。周揚在1946年發表的〈論趙樹理的創作〉中說：「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

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一篇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鬥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寫得為大眾所懂得。他不滿意於新文藝和**群眾脫離的狀態**。他在創作上有自己的路線和主張。同時他對於群眾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這正是他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的結果。……『文藝座談會』以後，藝術各部門都得到了重要的收穫，開創了新的局面，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我歡迎這個勝利，擁護這個勝利！」⑧

劉再復說：「高行健獲獎之後，我講兩個最重要的觀點：其一，這是我們**母親語言（漢語）的勝利**；其二，這是瑞典學院評獎史上的一個傑作。因為它獎給了一個**最具有文學狀態和最具有徹底的文學立場的中國作家**。」（頁71）

看周揚—劉再復兩人用的四個關鍵詞：人民藝術家—中國作家，傑作—傑作，狀態—狀態，勝利—勝利。

2000年10月16日，劉再復在香港《明報》「世紀」副刊發表的〈最有活力的靈魂〉，說高行健是中國作家中最有活力的靈魂，是堅忍不拔的毅力支撐其自由創造的天才活力。劉再復在此文中，借用毛澤東「老三篇」中〈紀念白求恩〉一文的話語方式，表達了對高行健的敬重（筆者把這種表達簡稱為「五個人」）。毛澤東說⑨：

劉再復用毛澤東評價魯迅的文體方式來評價巴金。毛澤東連用六個「是」，五個「最」；劉再復連用五個「是」，四個「最」。因為巴金的地位不可以比魯迅高。

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劉再復的表達是⑩：

如果認真地讀完他的全部作品，**就會感到這些作品的作者，是一個真正自由的人，一個渾身燃燒着熱血但筆端極為冷靜的人，一個高舉個性旗幟卻拒絕尼采式個人主義的人，一個勇於質疑社會卻更勇於質疑自我的人，一個不斷創新卻又最守漢語法度的人。**

劉再復的文章中有兩個表達系統同時存在，一個是「毛體」（以至於可以說「周體」）對他宏觀結論（定性、定位）表達方式的直接影響；一個是他自由自在的個體言說。二者並不矛盾，有時結合得很好。他能如此消解兩個語言表達系統的內在張力，殊為不易。他論現代文學諸子，涉及魯迅、巴金、張愛玲、趙樹理、高行健、金庸、李劫。從上可見，他對巴金、金庸、高行健的結論性評價是借用「毛體」、「周體」作為表達句式。

慈眉善目的劉再復，有着綿羊般的溫順和善良，但他的文學評論事業卻是從吃着老虎的乳汁開始的。那些文章中散發出的王者之氣，是來自老虎的乳汁，並成為揮之不去的習性，不自覺地籠罩在他的文風上。讀他的文章，有時總感到文中有兩個劉再復在說話，甚至覺得是兩個不同的人寫的東西。

最後，用劉再復和林崗的合著中關於高行健《逃亡》的一段話結束本文：「自我的地獄才是最後最難衝破的地獄，不管你走到哪個天涯海角，這一地獄總是跟着你。用戲中之語言來說：你可以逃出政治極權的陰影，但是很難逃出自我的陰影。」⑪

註釋

① 轉引自劉劍梅：《狂歡的女神》（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頁146。

② 劉再復：《放逐諸神——文論提綱和文學史重評》（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449。

③ 劉再復：《高行健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7。

④ 胡適：〈易卜生主義〉，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613-14。

⑤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663。

⑥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698。

⑦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74。

⑧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載《周揚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486-87、487、498。

⑨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60。

⑩ 劉再復：《論高行健狀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頁33。

⑪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414。

劉再復的文章中有兩個表達系統同時存在。一個是「毛體」（以至於可以說「周體」）對他宏觀結論（定性、定位）表達方式的直接影響；一個是他自由自在的個體言說。